

第 1 章

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

我们先分析价格机制的双重功能。一种商品或者生产要素的价格，无论是对于它们的使用还是对于它们的所有者出售它们获得的实际收入，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价格的“效率”和“分配”特性。

正如所有的职业经济学家都知道的那样，无论是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还是由计划当局正确运用的相对价格，都有助于引导经济系统有效利用资源，即引导经济系统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资源使用既不会导致一位公民比其他公民富有，也不会导致任何另一位公民比其他公民贫穷。因为，如果稀缺资源定价较高，而丰裕资源定价较低，那么，资源使用者总会试图采用“有效的”方式——相对少用稀缺资源，而相对多用丰裕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无论是购买原材料和其他生产要素作为某个生产过程投入品的企业主，还是购买消费品和服务的家庭主妇，只要是资源使用者都会这样做。但是，这样一个“有效的”系统当然有可能导致不受欢迎的实际财富分配。如果公民甲除了一种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如他自己的非熟练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但要为家人提供价格昂贵的福利品；而

Efficiency, 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

公民乙碰巧拥有一种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如一种稀缺的自然资源），但只要为家人提供价格低廉的享受品，那么，公民甲与公民乙相比就会非常贫穷。

当然，我并不认为，单靠一种事事任由市场力量自由运行决定的自由放任政策就能促成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职业经济学家都非常清楚，政府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策措施来排除阻碍这样一种解决方法的一切障碍。

第一，为了保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商品和服务的总有效需求必须通过实施货币和预算政策来加以控制。

第二，有必要开展法国式的预测和规划或者采用英国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张的方式进行预测和规划，以便让许多独立的决策单位对未来状况有一整套更加清晰、一致的看法。

第三，垄断势力和市场缺陷会导致价格背离成本。制止竞争限制协议的立法、价格管制、提高进口竞争性产品的自由程度，可被列为解决其中某些问题的适当举措。在另一些情况下，社会化和中央政府管理是合适的补救措施。

第四，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如城市交通拥堵、噪音污染、汽车尾气排放）的例子数不胜数，需要政府动用税收、补贴或其他规制手段来协调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在治安、国防和司法等诸多领域，社会关切远比私人利益重要，因此，这些领域的活动最好直接由政府当局来管理。

第五，消费者缺乏商品知识，并且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国家应该阻止私人商业广告，并且发展公正的消费者研究和信息服务机构。

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可列举许多。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现在要谈的核心问题无非是，即使国家正在致力于构建使经济系统有效运行所必需的一切，也仍有必要把价格机制作为效率指南来利用。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国家必须构建能使经济系统内部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协调的制度和政策基础，但仍有必要给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最终产品和服务标上价格，以便引导那些负责日常决策的人（无论是私营企业主、政府机构公务员还是家庭主妇）根据要素、商品和服务的丰裕和稀缺程度来进行决策。但是，这个用来提高效率的价格有可能导致很不受欢迎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这种两难困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世界效率的角度看，给一种丰裕的初级产品规定低价，是充分利用这种丰裕资源所必需的，而这种初级产品的生产商却属于世界最贫困的公民。在一篇题为“国际商品政策”^①的论文中，我试图设计一种能够分离初级产品价格的“效率”与分配效应的政策。

在本书中，我打算更加认真地为另一个或许更加基础的价格完成相同的任务。我所关心的这个价格就是劳动力的工资率，劳动

① 这篇论文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所写，并于1964年7月被《劳埃德银行评论》全文转载。

力的工资率水平能够产生最重要的“效率”和“分配”效应，而我最关心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则是针对那些影响产权的政策措施和制度进行的改革。近来，这样的改革竟然令人惊讶地被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忽视，但我的目的是要指出，从长期看，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能够为协调实际工资率水平的期望“效率”与“分配”两个方面提供最重要的手段。

目前，实际工资率这个例子中的两难困境以最严酷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上人口稠密的不发达国家里。我在一篇 1961 年发表的论文^①中曾试图阐明在一个像毛里求斯这样的经济体里这种价格两难困境的性质。毛里求斯可被作为世界上发生人口爆炸的广大不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缩影。

毛里求斯是印度洋上一个产糖的小岛国，但人口增长迅猛。毛里求斯是一个典型的单一作物经济体，99% 的出口和 40% ~ 50% 的国民产自来自于制糖业。大型糖厂和大部分最好的土地由富有的业主拥有，富有的业主主要是法裔移民。甘蔗种植园由比较贫穷的以印度后裔为主的工人耕种。1946 ~ 1947 年，流行于毛里求斯的疟疾得到根治，死亡率由 4.4% 下降到了 1.4%，但出生率没有下降，人口开始以每年 3% 的速度增长。由于 15 年后的适龄劳动人口现在已经出生，因此可以这样计算：无论现在出生率发生什么变化，15 年后的劳动力要比现在增加 50%。如此一来，现在已经非常严重的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在未来一定还会变得更加严重。

① “毛里求斯：毛里求斯经济状况的案例研究”，《经济学杂志》，1961 年 9 月。本书以下几个段落的内容基于这篇论文。

我们来看看古典经济学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毛里求斯是一个非熟练劳动力极其丰富而土地和资本品稀缺的经济体。这就是在古典竞争经济中地租、利润率和利息率上涨而实际工资率下降的状况。这种状况每每会激励私人生产商和政府当局从事需要很多劳动力、较少土地和资本的生产，并且为生产任何产品和服务选择需要使用很多劳动力以及少量土地和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技术。

最终的目的当然不是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利用社会（稀缺的）土地和资本资源以及丰裕的劳动力资源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而且，这也被认为是古典价格机制能够实现的。地租和利息上涨，而工资率下跌，会诱使生产商用给定量土地和资本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前提当然是因此而能创造更多的产出——没有一个企业主会为了生产数量较少或者价值较小的总产出而用给定量的土地和资本去雇用较多的劳动力。确实，这样利用价格机制的一个主要好处，就是不会选择低效率的技术去为了工作而工作。

可以说，这个原则无疑与像毛里求斯这样的经济体具有极大的关系。略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甘蔗田除草可人工完成，或者至少部分可用进口化学除草剂来完成。甘蔗种植园使用哪种除草方法有利可图，基本上取决于劳动力的工资和可获得性。另一个例子是搬运做好的砂糖。采用劳动密集型方法，砂糖在甘蔗种植园的工厂里装包，走铁路或者公路运到路易斯港，并且靠人搬上货轮，然后开包把砂糖倒入船舱。换用资本密集型散装法，那么就是砂糖

Efficiency, 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

在厂里自动装入专门的卡车集装箱，然后用卡车运到码头并自动卸入码头上的筒仓里，再把砂糖从筒仓自动装入停靠在码头旁的货轮的船舱里。这种方法可以节省路易斯港装卸、糖厂搬运、麻类植物种植和麻袋制作（目前在毛里求斯由一家政府经营的工厂完成）的劳动力，而且还会涉及购置新卡车、修建直接能停靠在码头旁的深水泊位的货轮、添置新的港口设备等非常巨大的资本支出。这不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法，主要取决于所需资本设备的购置成本和劳动力的工资率。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在毛里求斯发展茶叶产业的问题。茶叶是一种劳动密集度相当高的作物，种茶每英亩的劳动力雇用水平比种甘蔗高。毛里求斯有望生产优质茶叶，仅仅是因为茶叶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作物，非常适合节约土地和大量使用劳动力的生产方式。但也由于茶叶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作物，因此，工资在茶叶生产成本中占据很大的比例。目前，毛里求斯的工资率显著高于锡兰（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译者注）和东部非洲国家。毛里求斯的茶叶要与这些国家的茶叶竞争，这个新的就业渠道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毛里求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只有建立和发展某些制造业，毛里求斯才能为其迅速增长的劳动力找到生产性就业机会。毛里求斯不能依靠目前的主要产业即制糖业来为其迅速增长的人口找到就业机会。制糖业是一个雇用劳动者人均产出不断增长的快速发展产业。目前，世界食糖市场坚挺。然而，即使毛里求斯的食糖市场能以与其食糖产量一样快的速度发

展，适合种植甘蔗的土地也十分有限，因而必然会给毛里求斯制糖业的就业水平设定一个严格的上限。其他农业生产部门有可能实现比较显著的扩展，但土地约束最终仍会导致难以在这些农业生产部门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

毛里求斯必须发展工业。但在制造业方面，毛里求斯这个岛国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毛里求斯几乎没有制造方面的技术或者制糖工厂以外的工业管理经验、技术培训，只有很少的原料，资本也不富裕；毛里求斯的国内市场难以单独支撑大规模生产。毛里求斯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中国香港、牙买加、日本和英国那样的经济体，把进口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出口。但是，毛里求斯光依靠廉价劳动力就能建立这样的制造业吗？至少最初，丰裕的劳动力是毛里求斯的一个比较优势。

虽然古典学派的简单答案可能就是降低毛里求斯的工资水平，但实际上，最近几年正好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生活费用和货币工资水平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期后，1956 ~ 1959年期间，虽然生活费用没有变化，但制糖业（被毛里求斯其他部门作为基准）的工资水平上涨了45%。像毛里求斯这样的社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基本的经济两难困境或者悖论。在毛里求斯，就大甘蔗种植园以地租和利润的形式赚到了丰厚的收入这一点而言，制糖业肯定是非常繁荣兴旺，然而，受压迫者的政治意识与工会咄咄逼人的行动显得很协调，从而提高了作为毛里求斯部分财富再分配手段的制糖业工资水平。但从最优利用资源的角度看，毫无疑问，毛里求斯的工资

率应该很低。

此外，工资率对像毛里求斯这样的经济体的租金和利润的影响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在毛里求斯，大甘蔗种植园事实上把很大一部分利润投资于制糖业。利润税税率很高，高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也很高，并且实行累进制。这些直接税由一个高效率的税务行政机构征收。结果，高总利润和租金都直接投资于制糖业的资本开发，或者增加了政府预算收入，国家又用预算收入来为制糖业以外的资本开发提供大量的资金。因此，高工资率也容易通过减少私人 and 公共资本积累来源来降低经济发展速度。

这也许是这样的人口过剩的不发达国家的基本经济难题。让我们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考察一个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可支配劳动力全部就业，劳动力边际产品就等于零。于是，为了创造国民收入，就应该向一切想使用劳动力的人免费提供劳动力。当然，如果工资率被设定为 0，那么，虽然国民收入可以实现最大化，但会以租金、利息、红利和利润的形式全部被财产所有者占有，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如果工资率设定在一个能够合理地把部分国民产值分配给劳动者的水平上，那么就会出现就业不足和失业；即使可免费使用劳动力并因此而实现高利润率，但也无法吸引外国资本；^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和产品将受到抑制；通

① 在很多不发达国家，工资率高于充分就业竞争均衡状态下的工资率，这可能是解释资本被吸引投资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资本—劳动力比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而不是资本供给较之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较少的不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样的不发达国家里，如果工资率降到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劳动力边际产品，那么，资本回报率就会大幅度提高。

常在需要节约劳动力而不是资本的发达国家培养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无论怎样都不会受鼓励应用新的科学知识去发明能使很多劳动力与很少资本设备有效工作的新方法；经济就不能像由外国生产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那样富有竞争力；而资本积累来源以及经济增长来源则有可能濒临枯竭。

像毛里求斯那样土地和资本资源稀缺、面临人口严重过剩威胁的不发达经济体，以最具戏剧性的形式展现出了效率与分配之间的冲突——为了经济效率，劳动力就应该被作为一文不值的物品来对待，而零工资率则会导致毛里求斯的国民收入几乎都被几位“糖业大亨”分占。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静态叙述了经济系统的效率问题，也就是说，就像在叙述一个使用今天的资源既没有改善任何人的现状也没有导致任何人的现状有所恶化的问题。当然，事实上，今天的很多生产活动是在制造资本设备，而资本设备会被用来增加一些人明天、后天乃至大后天的商品和服务最终消费。把较多的资源用于今天的消费生产，把较少的资源用于今天生产资本设备，总能够改善部分公民今天的生活，而不会导致其他公民今天的生活恶化；而今天制造的资本设备既可用于生产明天的消费品，也能用于制造明天的资本品；而明天的资本品又可用于生产后天的消费品；以此类推。倘若我们考察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经济体，那么就能明白，只要既不让一些公民在这一时点上境况有所改善，也不让另一些公民的境况在同一时点或另一某个时点上变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在运行。

我们经济体中的每个生产商个体，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要面对一组他能够据以出售任何他所选择生产的消费品（如面包、内衣）的价格以及一组他据以销售其选择生产的资本品（如犁、织布机）的价格；同时有一定量的资源（土地、劳动力、现有资本设备）可用于生产以上不同的产出——面包、内衣、犁、织布机。生产商之间为了获得可支配资源而展开的竞争会抬高每种资源的价格，直到以最有效的方式把每种资源用在生产率最高的用途上才有利可图时为止。这样就能按不同产品的给定售价使总产出价值达到最大化。对可支配生产性资源采用这种竞争性竞价方式有可能提高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直到它们的售价有可能出现只有少生产 1 英镑内衣、犁或织布机，才能多生产 1 英镑面包的情况。

以上这种资源使用方式就是一种充分有效的方式，条件就是正确预测市场价格和技术生产可能性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精确证明这个难解的命题，但可采用以下方式凭直觉来证明。

只要关系到直接消费品（面包和内衣），现行市价就能测度它们对消费者的重要性。因此，多生产 1 英镑的内衣、少生产 1 英镑的面包，或者多生产 1 英镑面包、少生产 1 英镑内衣，都不可能改善现在消费者的状况。现在消费者的状况只有通过少生产未来使用的犁和织布机来改善，也即以牺牲未来公民的利益为代价。

现在只剩下要问，通过改变今天资本品产出的构成，在不恶化未来其他公民境况的情况下，是否就不能改善未来部分公民的境况？举例而言，假定生产一张犁的成本与生产一台织布机的成本相

同，而且今天为未来多生产一张犁、少生产一台织布机，就会改变流向未来市场的消费品供给，即未来有较多的面包和较少的内衣可以消费。假设通过这样的一种改变可以保证所有消费者在每个时点上生活得一样好（增加供给的面包在未来每个时点上价格都与减少供给的内衣相同），除非在某个时点上，某些消费者的境况得到改善，但不会导致任何其他消费者的境况恶化（增加供给的面包在那个时点上价格高于减少供给的内衣）。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些市场条件和技术可能性都被正确地预见到。于是，一个企业主现在准备对犁开出比织布机高的价格，因为犁的回报率预期好于织布机的回报率预期，并且多生产犁，少生产织布机。这样，今天的资源使用方式就摆脱了低效率的资源使用模式。

因此，为了按照一种能引导高效使用今天资源的模式确定今天的价格，我们必须知道未来的技术生产可能性以及未来的价格模式。当然，这个条件绝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尽管比较、协调和评估个人未来发展计划方面的系统合作（如以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形式）有助于达成更加准确的未来市场状况预期。

但是，定价的“效率”与“分配”特性之间有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基本问题。经济体随时间发展这一事实，会以我们刚刚考察过的方式使出于效率目的的价格使用问题复杂化，但绝不会保证被我们作为有效利用今天资源最佳指南的价格能带来令人满意的对今日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我已经相当详细地阐述了一个随时间获得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应该具有哪些特点的问题。不过，这样一个有效的路径必然不同于所谓的最佳时间路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如果在时间上始终无法重新安排对今天资源的使用，以便在不影响任何目前和未来消费者的前提下改善未来某些消费者的境况，那么，这种时间路径就是有效的路径。假定在这个意义上，时间路径持续有效，那么，还有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如果必定会影响今天的消费者，那么，让未来的消费者生活得更好是否就实际不可取？通过增加今天的储蓄，从而减少今天的消费者花在今天的消费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并且增加今天的公民对新机器和其他实物资本设备的投资以供明天的公民使用，总能让未来的消费者生活得更好。最佳时间路径就是那条在无数可能的有效时间路径中能够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在不同年代的消费者之间分配实际消费的时间路径。

现实中，在选择经济政策时有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牢记心头：

第一，资源不应该由于存在非自愿失业而被浪费。货币政策（通过收紧或者放松贷款购置资本品的条件）和预算政策（通过税收来提高或降低私人支出能力，或者通过减少或增加政府的商品和服务支出）可以用来降低或提高商品和服务的总货币支出水平，以保持经济资源需求与供给总水平之间的均衡。

第二，不但应该把稀缺资源用于生产有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应该以本书详细阐述的充分有效的方式来利用稀缺资源。

第三，在任何时点上都应该把收入和财富公平地分给社会全体公民。

第四，最好在任意时点上都能达到最优储蓄水平，即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在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公民之间分配实际消费。

本书主要关注第二和第三条基本原则，即关注利用价格机制来实现经济效率与利用价格机制来实现分配公平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本书的以下章节里，我将简单地假设，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的使用总体上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即简单地假设以上第一条基本原则能够成立。下文要讨论的许多措施都会影响储蓄水平，因此，虽然本书没有系统讨论最佳储蓄水平，但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第四条基本原则。确实有某种理由认为，任由公民个人自愿储蓄，那么，储蓄水平就会低于社会所希望的水平。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公民个人短视；还因为个人不像国家，总有一死，而且对后代的利益不会像对自己的利益那么关心。因此，我们在下文中会偶尔谈及不同政策对储蓄水平的影响，并且认为任何倾向于降低储蓄和供后代使用的资本设备投资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政策是失败的政策。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题——价格特别是实际工资率的效率与分配特性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像英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来清晰地看到一个随时间发展的经济体发生这样一种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冲突在发达国家没有在像毛里求斯这样人口过剩的不发达国家那样明显，但还是存在的。在一个像英国这样

Efficiency, 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

的工业化国家里，任何时候都有大量的现存自然资源和固定资本设备——不同品质和位置的土地、不同形式的厂房和机械设备（有新的，有旧的，也有专门为某个产业的某种用途设计的，还有多用途通用设备），等等，同时劳动力中还有大量的现有劳动者，有年长的、年轻的，也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一点儿教育的，另有受过专业培训或者一般培训的，还有无技能的、聪明的、愚笨的、强壮的、体弱的、喜欢待在一个地方不动的、老想挪地方的，等等。在不同行业产品的相对需求（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由我们对未来条件的正确预期所决定的本期资本品需求）既定的情况下，效率要求把现有的劳动力配置在现有的土地和资本设备上，以便一个被安排在某一点上的劳动力所创造的追加产品价值不小于被安排在经济系统任何其他点上生产的追加产品。效率并不要求所有的现有土地和机器必须得到利用。如果劳动力稀缺，土地和机器充盈，那么，最好只把有限的劳动力安排在效率和生产力最高的土地和机器上。反映劳动力短缺的高工资水平会导致不发生实际亏损就不可能利用其他土地和机器安排生产。土地是一种次边际资源，而机器则会过时。当然，完美无缺绝不可能。不过，要想合理趋近于这种有效使用劳动力、机器和自然资源的模式，就必须对不同种类的劳动力确定现行价格或者工资率，并且用以指导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不同雇主以最有效的方式雇用可支配劳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资本品会因老化和磨损而发生有形损耗，而其他新设备又会被建造出来。改进后的技术知识会影响新设备的生产能力，而且还会以较低的程度影响某些旧设备。劳动人口的规

模有可能发生变化，劳动力新成员教育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也可能获得增加。有效地把新的劳动力安排在新的设备上，也许要求实际工资水平和格局发生某些变化。

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里，这个过程通常会引发人均产出持续增加。净资本积累意味着新造的机器和厂房必须多于发生有形磨损的机器和厂房。技术进步会增加每位被雇用劳动者的产出；而教育和培训投资的增加则会提高劳动生产率。除非新增劳动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并且被安排在大量的新增设备上，不然实际人均产出就不可能增加。但是，正如每位职业经济学家都知道的那样，人均产出（平均劳动产品）不同于因雇用追加劳动力而实现的追加产出（边际劳动产品），是追加产出，而不是人均产出，与作为资源有效利用指南的实际工资率有关，这才真正是我们的难题的关键所在。实际工资率应该在效率的基础上，与通过多雇用劳动力创造的追加产品价值联系在一起；可供全体公民分配的实际总收入应该由人均总产出的价值来决定。如果边际劳动产品少，而平均劳动产品多，那么，基于效率支付的工资只能占实际总收入的小部分，剩下的实际总收入都以利润和租金的形式被财产所有者所占有。

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很大比例的实际产值被财产所有者分享，而财产则被非常不公平地占有。因此，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效率所要求的是工资率格局可能会导致极少数富有的财产所有者享有高水平的实际人均收入。而且，这个问题虽然不一定但有可能因自动化而变得更加突出。

对于工程师来说，工业自动化就意味着把一种特殊类型的控制装置引入生产过程；而在经济学家的术语中，我猜想，工业自动化就意味着技术进步的高速度与明显的劳动力节约倾向。自动化必然会借助于新的自动化机器来提高人均产出，但可以想象也会在给定成本下大幅度减少每一台新机器所需的劳动力，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需求实际下降。倘若资本设备出现净积累，而新的自动化机器所需的新劳动力实际少于新增劳动力加上因报废有形磨损的旧机器而变得冗余的劳动力，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为了吸纳新增和冗余劳动力，把他们安排到其他最好的用途（如先前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机器或者不需要机器的家政服务）上，也许要求根据效率原则绝对降低实际工资率。显然，即使这种极端情况能够避免，自动化也很有可能导致人均产出增长快于边际劳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效率定价原则要求把那部分不断增长的产出分配给财产所有者，而且分配的难题甚至也会相应激化。

有关自动化世界出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讨论大多是从人口人均实际产出和实际收入增加的角度展开的。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一两个小时就能获得足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全部实际商品和服务时，我们大家将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去做什么？然而，这个问题真的比前面那个问题难答许多。我们应该这样提问：当每工时产出很高，但基本上全部被少数财产所有者分占，而广大劳动大众的境况比过去相对（甚或绝对）恶化时，我们大家该怎么办？